

● 哲 学

论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合理性及现实意义

赵 树 峰

(武汉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赵树峰(1973-),男,内蒙古林西人,武汉大学人文科学学院哲学系博士生,主要从事科学哲学与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摘 要] 我国学界目前对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探讨,多侧重从其否定、摧毁之层面着手,而对其建设性的内涵则重视不够。事实上,后现代科学哲学家中的激进派、建设派代表人物对于“科学”的论述新颖而独特,其中两种典型科学观对于突破传统的思维定势、确立面向未来的科技发展战略具有重要借鉴意义。当前,关于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理论与应用价值问题,应作深入研究。

[关键词] 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创造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 B 1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374(2000)04-0471-04

在现代科学主义者看来,自然科学知识是人类知识的典范,它可以推广用以解决人类面临的所有问题,自然科学方法可用于包括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一切研究领域。他们的信念是,科学是以证实原则为基础而建构起来的,科学文化以此区别于其他文化类型;科学所依靠的是理性的方法,科学所追求的是理性的结果,科学的应用是最为成功的理性应用;我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是科学与理性,凡是合乎科学的就是合乎理性的;从价值论角度来看,科学的依据是独立于理论的经验事实,因此并无价值负荷。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主要指科学哲学家)对上述的科学观、科学方法论标准予以猛烈抨击,否定现代科学主义者对真理的寻求,并代之以崭新的科学发展模式。本文试图揭示后现代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缜密思考,以领略其中新颖、独特的理论视角和丰富、复杂的思想内涵。

一、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对科学理性与真理的否定

在当代科学哲学领域,后现代主义的萌芽可追溯到波普尔那里,他较早的对现代科学主义(主要指逻辑经验论)所谓“正统观点”发难。按照波普尔的论证,科学的目的在于有趣的、大胆的和有丰富内容的理论,而不在于平凡琐屑的真理。因为,真理不是科学的唯一目的,科学在其现实性上说,只能是充满猜想与假设的逼真性理论。他彻底抛弃为科学主义所推崇的确实性思想,主张在科学的任何层次上都没有经验的

确实性。他还认为,科学和非科学的划界标准是可检验性,即对基本信念的检验,是为了检查已被接受的理论的缺陷,或使流行理论经受最大限度的严峻考验而进行的检验。自此,科学哲学界开始出现了否定科学权威的思想倾向。随后,库恩认为科学“是一个具有无限权威的科学共同体的集体心理约定”,是解决“疑难”的结果。有一个能够维持常规科学传统的“范式”的存在,是区别科学与非科学的特征。尽管有人认为库恩晚期的理论发展站到了“后现代”的对立面,但库恩所提出并发展的“范式”概念,作为历史发展的结果和科学探索的前提,已经把历史的和概念的相对性引入了对于科学的理解之中,而他所阐述的内涵丰富的“不可通约性”概念,则直接酝酿了“反本质主义科学观”。因此,同样把库恩视为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的先驱。

费耶阿本德对“科学”概念所做出的革命性变革是最为彻底的。费氏在反对绝对科学主义、权威主义、本质主义的基础上,尽全力指摘现代科学中的教条主义和唯我独尊,以犀利的言辞攻击当今世界流行的科学沙文主义。他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不存在划分科学与非科学、科学与宗教和神话的绝对普遍的标准”,“科学之外无知识”的观念是错误的,科学仅仅是众多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它应该与巫术、宗教等其他传统意识形态和平共处。他指出,“科学只是人所发明以便应付他的环境的工具之一。它不是唯一的工具,不是绝对可靠的”^[1](第180页),这一工具“是引人注目的,喧闹的和卤莽的”^[1](第181页),而且“它已成为太强大的,太富

于进攻的,让它放任自流就太危险了”^[1](第 181 页)。按费耶阿本德的意思,更符合实际的说法应该是,科学不应该比其他文化方式具有更大的权威,科学并没有固定的和普遍的方法论规则可供遵循,“没有‘科学的方法’;没有任何单一的程序或单一的一组规则能够构成一切研究的基础并保证它是‘科学的’、可靠的”^[2](第 54 页)。我们可以透过费氏所阐释的科学观清楚地看到他在认识论上的相对主义倾向。更为根本的是,他对“科学”做出这样的界定,用意在于消解科学划界问题,并进一步提出其“反本质主义”的“异质”科学观,借以反对传统的“齐一”科学观。他认为,科学的本质是反对理性主义方法的,这些方法本身只能使科学变成理性的奴隶,理性方法不能够提供说明科学发生机制的必要手段,相反,科学发现、科学发展的实际过程表明,“松散的和非理性的”方法常常是更为重要的,“甚至在科学的内部,理性也不具有广泛的效用,因此,必须经常剔除它,而这将有利于其他动力的发展。没有一种法则是普遍有效的,没有一种动力是始终如一可以被运用的”^[3](P. 179)。一句话,科学需要的是“无原则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认识论,科学离不开非理性因素,应该接纳“怎么都行”的多元方法论原则。费耶阿本德的科学哲学是“独创见解和人们所不能接受的结论的独特混合”^[4](第 248 页)。“无原则主义”科学观尽管过于偏激,但它却可以使人们突破传统科学主义的思维定势,正确运用发散式的思维方式,从而摆脱纯理性思维的羁绊,给非理性思维一席之地。

费耶阿本德的这一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整个后现代科学思潮的主导思维风格,体现为后现代主义合理的多元思维观念。正如大卫·格里芬所指出的,“无政府主义或相对主义的观点认为,‘什么都行’,不存在什么科学的方法,这一观点的确相当强大。但事实上正如人们所期望的,它起到了一个有益的功效,使我们摆脱了何为科学的偏狭的限制。后现代世界对科学的描述势必要比现代对科学的描述(即真正的规定)限制少得多”^[5](第 32 页)。在后现代世界中生活的人们看来,“现代性及其世界观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毁灭性”,“持续危及到了我们星球上的每一个幸存者”^[6](序言第 19 页)。此后,社会建构论者等开始将其倡导的社会维度引入了对于科学的理解之中,逐渐拒斥科学理性观念,并进一步宣扬“反本质主义”、“反基础主义”的科学观,以此反思科学主义追求完美的科学知识、科学真理或科学理性的实践。

美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的科学观是很具有代表意义的。他与费耶阿本德一样,主张消解(dissolve)而不是解决(resolve)科学与非科学的划界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科学与文化其它部门的分界不足以构成一个独特的哲学问题”^[7](第 109 页)。科学并不具有特别的认识论地位,它不过是人类话语的一种形式而已。它与哲学、艺术、宗教、神话等一样,都只是“一种文化样式”。在罗蒂看来,传统科学是与客观性、真理、理性、有序等联系在一起的,其中,客观性是这种联系赖以存在的基础,而这种联系不可避免会产生形而上学困境。因此,我们应该否定科学的研究对象,即物质世界的客观性。当然,这是我们所坚决反对的。但在罗蒂看来,科

学不应该作为自然类而出现,相反,科学只能作为协同性而存在。因为,在人类意识中追求协同性而非客观性的实用论做法,可以有效地避免过多关心社会实践与外在事物之间的关系而产生的形而上学困境。实际上,罗蒂所倡导的“后”哲学文化就是“反”哲学文化,进一步而言,便是“反”科学文化。此处的“协同性”主要指信念上的协同,它反对传统科学意义上的实在性概念,而以有用性和伦理价值作为基础。一般认为,罗蒂科学观的实质是新实用主义的“合理性”观念支配下的信念和价值观,其出发点同样是反对科学的文化权威,体现为论证更详尽的“反本质主义”科学观。

此外,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等人也认为,自然科学独霸的内在冲动,以唯一的标准去侵吞叙事知识,这将使一切知识陷于“非合法状态”;法因、范弗拉森等人则进一步否认科学真理的存在,主张科学主义时代的各种真理观都是错误的、不尽人意的、不合科学活动的本质。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激进的后现代主义科学哲学家对科学的反思有一套共同确信的东西,“首先,科学没有固定不变的基础,所以没有绝对确定的知识,知识都有待于修正。其次,科学不是无活动能力的世界的客观表象,而是作为认知主体和被认知的世界相互作用的结果的建构性结构。”^[8](第 11—19 页)在此认识的指导下,他们对基础主义和本质主义认识论加以否定,最终导致对真理、理性和科学的价值的全新认识以至彻底清算。

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 对“科学”的精致论证

在以美国“后现代世界中心”主任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建设性后现代主义学派中,对于“科学”的探讨,远比罗蒂、霍伊等人更为关注现实的人与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这一学派中的成员很多是权威科学家,“科学”自然是他们探讨后现代诸问题的最基本的出发点,而他们的观点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有益的启示。综合起来看,大卫·格里芬等人的科学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在对“科学”范围的理解上,主张科学并不仅仅局限于唯物主义“可以理解的事物”,并不仅仅局限于“现实存在的范畴内”。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的科学观(例如本世纪以来的物理学观念)注意的焦点,主要是借助于动力因而运作的、事物的纯粹物质方面,并不言及主体性、目的、自由和感觉等一切“非唯物论的相互作用”。格里芬等人直截了当地反驳道,“假如科学的真正实质是唯物论的,精神的科学怎么能够存在呢?”^[9](第 6 页)按照科学主义者的描述,科学本身“是现实主义的,力图表述事物的本来面目”,而在格里芬等人看来,前者的科学观“还是帝国主义的,决意提供唯一真正的表述”^[10](第 7 页),其实质就是科学沙文主义。他们进一步认为,“科学”的范围理应得到拓展,关于人类精神以及理想存在的学科(象逻辑学、美学、伦理学等),都不应该被排除在科学的范畴之外。与费耶阿本德等后现代的科学哲学家一样,他们所反对的并不是“科学”本身,而是反对传统的“科学”界定,反对本世纪以来肆意泛滥的、“允许现代自然科学

数据单独参与建构我们世界观的科学主义”,主张消除科学自身的缺陷及其异化造成的巨大危害。

其二,在“科学”的认识起点和思维方法上,主张以怀特海的有机论作为出发点,倡导整体性思维方式。格里芬等人非常推崇怀特海的理论,认为怀特海是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重要奠基人。他们信奉有机论,强调改变现代人的机械论世界观(以哥白尼、吉尔伯特、牛顿等人的世界观为代表),改变现代人习惯占有的心态。具体而言,他们认为心与物的融合、社会秩序与自然法则的统一是完善的科学观的重要特征,自然法则是一种“进化的习性产物,物理定律应被看做进化而来的而且还将继续进化的习性,于是自然法则变成了社会法则,这种观点进一步消除了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的二元论”^[5](第19页)。他们主张“科学中的机械论范式应由生态学范式所取代”,也就是要用系统的、整体的、综合的、多元的和协同的科学观取代现代科学所惯用的线性观念。

其三,在“科学”与价值的关系的认识上,主张科学不是一种超越价值的事业。认为,科学活动,就其依据而言,不只是经验事实,还有价值观念或价值标准,科学活动内含着事实与理论、事实与价值的统一。大卫·伯姆指出:“后现代科学不应将物质与意识割裂开来,因而也不应将事实、意义及价值割裂开来。因此,科学与一种内在的道德观密不可分,而真理和美德由于是科学的一部分,也是不可分割的。我们的现状之所以如此危急,部分是由于这种割裂造成的”^[5](第76页)。科学不仅要遵循事实原则,而且还要受到外部价值观念和伦理观、真理观的影响;科学不仅要探索“是什么,是怎样的”,而且更要探讨“什么是好的和应该怎样”的问题。

其四,在“科学”与真理的关系问题上,格里芬等人认为,现代科学与真理并不具有等价色彩,科学的价值“不同于真理的纯粹的理智价值,其因素亦不同于理性和经验的因素”^[5](第10页)。具体来说,科学不是真理的不偏不倚的裁判,它不能无视相互争斗的社会力量,相反,科学被认为是一个相当偏私的参与者,它所寻求到的真理随不同的利益和偏见而有所选择。尽管如此,“任何可恰如其分地称作科学的活动和任何可恰如其分地称作科学的结论都必须首先以发现真理的极大热情为基础”^[5](第32—33页)。就是说,我们无需否认科学能够发现真理,也无需否认科学有时确实发现了真理。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科学有机论正是在继承、发展传统科学真理观中的符合原则和非矛盾原则的基础上,将科学视为“可以使人们学会对世界的思考方法”的手段,它可以使人们“对真正代表自然的模型和结构有越来越贴切的认识”^[5](第37页)。

其五,在对“科学”目标的看法上,主张背离与现代科学密切相关的机械论的和还原论的世界观,追求科学的实用性、有效性,力求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科学家、思想家非常推崇生态学的思维范式,在他们看来:“生态世界观让我们认识到,我们首要的错误是假设我们能够把某些要素从整体中抽取出来,并可在这种分离的状态下认识它们的真相”^[5](第141页)。而实际的情况是,“世界若不包含于我们之中,我们便不完整;同样,我们若不包含于

世界,世界也是不完整的。…如若我们将世界包含于我们的意识之中并施之以爱,包含着我们自身的世界就会有所回报”^[5](第86页)。换句话说,人类不是世界的主宰者,人类应该建立以生态价值观为基础的科技发展目标,为人类摆脱生存危机指出一条可行之路。具体而言,人们应该摆脱那种以非道德的态度运用科学的做法,否则,“世界最终将以一种毁灭的方式报复科学”。后现代科学必须消除真理与德性的分离、价值与事实的分离、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这一科学目标一旦实现,其结果将是“后现代人并不感到自己是栖身于充满敌意和冷漠的自然之中的异乡人。相反,…后现代世界中将拥有一种在家园感,他们把其他物种看成是具有自身的经验、价值和目的的存在,并能感受到他们同这些物种之间的亲情关系。借助这种在家园感和亲情感,后现代人用在交往中获得享受和任其自然的态度这种后现代精神取代了现代人的统治欲和占有欲。”^[7](第22页)

由此可见,格里芬等人所阐释的科学目标,既是从现实出发、放眼未来的产物,又是突破传统思维、将哲学之思与创新研究紧密结合的结果,具有很大的实践指导意义。

三、两种科学观带给我们的有益启示

在各种后现代思潮蜂拥而至的今天,我国学界也开始对它进行介绍和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然而,令人遗憾的是,目前国内学者多侧重于对后现代主义的摧毁、解构、否定性方面进行探讨,对这一思潮本身所蕴含的积极的、肯定的、建设性的内涵却研究得不够,结果很容易将后现代主义定位为否定主义的、悲观主义的甚至虚无主义的思潮。这一思维定势的局限性很大,在探讨其科学观时尤其应该避免。其实,尽管激进的后现代主义者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者的观点略显不同(譬如,前者大多反对科学理论的真理性,而后者并不直接反对,等等。),但它们带给我们的思考却同样都是很深远的。尽管有学者认为“后现代科学难以成立”,但后现代思想家的科学观的确给那些盲目追求科学理性的现代人打了一剂“预防针”,唤醒人们对科学理性的重新认识,有利于人们摆脱技术理性的沉重枷锁,进而寻求价值理性的合理存在,有利于新的科技文明的大发展。

最为可贵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想家不仅在理论上倡导创造性思维,而且身体力行,在自身的实践中也始终贯彻可贵的创造精神,这正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尽管费耶阿本德等人的理论并非无懈可击,其论证尚存在致命的缺陷,实际情况也并非像他们所认为的那样振振有词,但“在后现代主义多声部的大合唱中,创造的旋律始终占据着一个十分重要的地位,可以说,倡导创造性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特征”^[7](代序第3页)。事实上,“在后现代思想家那里,最推重的活动是创造性的活动,最推重的人生是创造性的人生,最欣赏的人是从事创造的人”^[7](代序第3页)。在大卫·格里芬看来,“从根本上说,我们是‘创造性’的存在物,每一个人都体现了创造性的能量,人类作为整体显然最大限度地体现了这种创造性能量”^[7](第223页)。换句话说,“后现代的前景依赖人类的首创精神,也依赖历史的发展趋

势。…敢于持异议和不墨守成规,对真诚地接受后现代可能性来说,同样是不可或缺的”^[7](第 149 页)。具体而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的合理之处在于:它实现了对科学主义者所信奉的理性精神的辩证“扬弃”,力求发展出以互补论作为基调的新科学理性,亦即沿着生成论与构成论互补、循环论与进化论互补、价值论与真理论互补三个基本方向建构后现代的“科学理性”。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尤其是建设性的后现代科学观)以生态学作为其立论的基础学科,从生态学的有机整体思维中受到启发,冷静思考了现代科学中最为寻常的分析思维,力求形成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系统思维方式。

尽管法因等人的科学哲学观有否定哲学对科学的指导意义的错误倾向,近乎“不要科学哲学的科学哲学”,但就其批判传统、敢于创新的理论勇气而言,很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尽管学界认为大多数后现代主义者的方法论和认识论包含相对主义的“毒瘤”,然而,其中部分思想家所提倡的“有机科学观”正是富有远见、走在这一领域前沿的科学观,充满创造性思维的激情。这对于身处现代世界的思维专家进一步拓展思维空间来说,尤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对于急需深入开展科技创新、思维创新以推进民族进步的国人而言,后现代主义科学观及其形成的思维机制确实可以为我们提供很好的参考。例如,后现代主义的科学价值观、目标观致力于倡导、推进后现代的生态意识,以此重建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这对于当今学界继续深入探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合理性和实现途径、对于社会决策层做出更加合乎实际的战略,无疑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特别是对于正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深入贯彻“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这一重要指导原则的中国来说,尽管后现代主义各种学派的理论良莠不

齐,其为数众多的科学观也是鱼龙混杂,但这块“他山之石”的合理内核确实可以为我所用。诚如大卫·格里芬所言,“中国可以通过了解西方世界所作的错事,避免现代化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这样做的话,中国实际上是‘后现代化’了”^[6](序言第 13 页)。的确,这样做可以促使我们从“人类中心论”、“西方中心论”的阴影下走出来,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不断发展科学技术,进一步提高综合国力,再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篇章。

[参 考 文 献]

- [1] 江天骥.当代西方科学哲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
- [2] 陈健.科学划界——论科学与非科学及伪科学的区分[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7.
- [3] FEYERABAND P. Against Method[M]. London: NLB,1975.
- [4] 舒炜光.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 [5]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科学——科学魅力的再现[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5.
- [6] 曹天予.科学和哲学中的后现代性[J].哲学研究,2000,(2).
- [7] [美]大卫·格里芬.后现代精神[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严 真)

Scientific Idea of Postmodernism: Rationality & Actual Significance

ZHAO Shu-fe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y: ZHAO Shu-feng(1973-),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Humanities,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philosophy of science & strategy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bstract: Although there have been many discussions on the idea of science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ese academic circles, the focus has always been its negative and destructive effects. We believe that the idea also has its constructive meaning, however, little attention has been paid to it. The paper tries to study the creative idea of some typical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on the same topic, holding that the idea will show its great significance if we try to form the appropriate pla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 technology. Therefore, we should advance the research on the idea's theoretical and applying values.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idea of science; creative thinking